

CHOUXIANG STORY

NOT RESEARCH



内群体苛刻：关于现代中国网民的社会心理学分析
——以刘翔、吴京、郑永康为例

**Ingroup Harshness: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
Internet Users**
— The Cases of Xiang Liu, Jing Wu and Yongkang Zheng

SRYQ¹

¹ N/A.

Correspondence: ink, 咕咕嘎
嘎高松灯. Email: N/A.

摘要

本文以社会心理学为理论视角，以刘翔、吴京、郑永康（ZmjjKK）三位在不同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公众人物为案例，深入分析他们在互联网舆论场中经历的“造神-毁神”循环现象。研究发现，这一现象的核心机制可概括为“内群体苛刻”——一种内聚力极强的群体对内群体成员（尤其是高位成员）施加的严苛审视与批判。本文从内群体偏见、刻板印象、认知失调、群体极化、集体自恋、替罪羊效应等理论视角出发，系统阐释“内群体苛刻”的形成机制，并揭示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：社会认同的博弈、压抑情绪的转移、互联网技术的催化，以及社会变迁中的价值观冲突。研究认为，“内群体苛刻”本质上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心理的投射，理解这一现象对于构建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关键词

内群体苛刻；社会心理学；刘翔；吴京；郑永康；网络舆论

1 | 引言

1.1 研究缘起：三位“国民英雄”的共同命运

2004年雅典奥运会，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追平世界纪录，成为首位在直道短跑项目上夺冠的亚洲人，他面对镜头挥泪竖起大拇指的画面，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。2017年，《战狼2》以56.94亿票房登顶中国影史榜首，吴京凭借“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”的口号，成为“硬汉精神”的国民代言人。2024年，郑永康（EDG.ZmjjKK）率队夺得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冠军并加冕FMVP，被公认为“CN瓦第一人”。

然而，这三位的共同命运不止于“取得成就”——他们都在登顶之后，遭遇了声势浩大的互联网批评与攻击。刘翔被冠以“刘跑跑”“演员”等侮辱性绰号；吴京的过往言论被翻出，成为全网鬼畜解构的对象，催生了“京学”这一网络亚文化；郑永康则在夺冠后陷入与争议主播粉丝的舆论混战，甚至被炮制出“偷走了CXY的人生”等荒谬论调。
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这种批评的严苛程度，远超中国网民对外国公众人物的审视。外国明星的失误往往被宽容以待，而本国英雄的瑕疵却被无限放大。这种“内外有别”的舆论现象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：为什么中国网民对“自己人”如此苛刻？

1.2 核心概念：“内群体苛刻”的提出

本文提出“内群体苛刻”（Ingroup Harshness）这一概念，用以描述一种特殊的群际心理现象：在内聚力极强的群体中，成员对内群体中的高位者（如公众人物、领袖、代表）施加远超对外群体的严苛审视与批判。

“内群体苛刻”与既有理论概念形成对话：

（1）内群体偏好（Ingroup Favoritism）指个体更偏爱和保护内群体成员。而“内群体苛刻”看似与内群体偏好相悖，实则是一体两面——正是因为对“自己人”有更高的期待，所以失望时的反噬也更猛烈。

（2）内群体贬低（Ingroup Derogation）指个体更偏爱外群体成员。但“内群体苛刻”并非偏爱外群体，而是对内群体高位者的“高标准、严要求”。

（3）集体自恋（Collective Narcissism）指群体成员相信本群体具有卓越性却未获得外界足够认可的心理。集体自恋者对外界批评极度敏感，而“内群体苛刻”则是这种敏感转向内部的体现——当内群体成员“损害”了群体形象，便会遭到严厉清算。

1.3 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框架

本文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，综合运用以下理论框架进行分析：

（1）社会认同理论：解释个体如何通过群体归属获得自尊，以及群体成败对自我价值的

影响。

- (2) 刻板印象与标杆理论：解释公众对“英雄”的符号化期待及其反噬机制。
- (3) 认知失调理论：解释公众如何通过“贬低当事人”来缓解理想与现实的冲突。
- (4) 群体极化理论：解释互联网环境下极端意见的放大机制。
- (5) 替罪羊理论：解释社会焦虑如何转移给特定公众人物。
- (6) 集体自恋理论：解释群体为何对内部“瑕疵”零容忍。

2 | 理论基础：理解“内群体苛刻”的社会心理学视角

2.1 内群体与内聚力：归属感的双刃剑

内群体（Ingroup）是指个体在情感和心理上认同的群体，是“我们”的范畴。以群体方式来描述自己——如种族、宗教、国籍、兴趣爱好——通常也意味着描述“不是谁”。在本文的三个案例中，内群体分别表现为：

- (1) 刘翔时代：内群体是“中华民族”“中国人”，刘翔是“我们的代表”。
- (2) 吴京时代：内群体演变为“爱国网民”“战狼粉丝”，吴京是“我们价值观的代言人”。
- (3) 郑永康时代：内群体高度细分，变为“CN 瓦粉丝”“EDG 粉丝”，康康是“我们赛区的骄傲”。

内聚力（Cohesion）是指群体成员彼此吸引、愿意留在群体内的程度，它决定了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力。当一个群体的内聚力极高时，会产生两个效果：一是行为趋同，成员更自觉地维护群体形象；二是对偏差零容忍，任何可能破坏群体完美形象的行为都会被放大审视。

内群体与内聚力的结合，形成了“内群体苛刻”的心理基础——归属感带来认同，而内聚力则转化为约束力。个体越是认同群体，就越不能容忍群体中的成员“丢脸”。

2.2 刻板印象与标杆期待：英雄的符号化命运

刻板印象（Stereotype）是指人们对某一群体成员持有的固定观念。当公众将一个人推上神坛，就会产生“英雄必然完美”的刻板印象。刘翔现象正是公众对体育和运动员的刻板印象造成的——在“东方人不能称霸短跑”的刻板印象被打破后，公众又建立了“民族英雄不能倒下”的新刻板印象。

标杆期待（Benchmark Expectation）是刻板印象的延伸：内群体中的高位者被赋予代表群体形象的使命，他们的成败直接关联到群体的自尊。正如有评论指出：“刘翔现象不是一个人的奇迹，而是众多社会心理倾向的必然集结。在被西方人垄断的短跑项目上称王，这是刘翔称王的最大意义，这个冠军的意义组成已经远远超越了体育的本原，被掺杂进太多的社会

元素。”

这种符号化命运的悲剧性在于：个体被剥夺了“普通人”的权利。刘翔的伤病被屏蔽，吴京的演员身份被遗忘，郑永康的个人情绪被忽视——他们不再是具体的个人，而是群体理想的投射物。

2.3 认知失调：当现实击碎期待

认知失调理论（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）由费斯廷格提出，指当个体同时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心理认知时，会产生不适感，进而采取行动消除这种不适。

在本文的案例中，公众的认知失调表现为：

- （1）理想认知：“我们的英雄是完美的”。
- （2）现实认知：“刘翔退赛了/吴京说错话了/康康表现下滑了”。

为了缓解这种失调，公众有多种选择：调整对英雄的预期、接受人性的不完美、理解客观困难。但更常见的路径是——通过贬低当事人来否定现实。正如有学者分析：“公众过于膨胀的价值期待，会刻意屏蔽一个运动常见的伤痛，非议他因伤退赛，更不允许他再次退赛，否则你就是骗子，就是社会的罪人。”

“骗子”这个标签，完美地解决了认知失调：如果刘翔是“假装受伤”，那么退赛就不再是英雄的失败，而是骗子的败露。公众由此保住了“英雄不会失败”的信念，代价是牺牲了刘翔本人。

2.4 群体极化：互联网时代的意见放大

群体极化（Group Polarization）指群体讨论往往会强化成员最初的倾向，使观点朝更极端的方向移动。互联网的匿名性、即时传播性和算法推荐机制，极大强化了群体极化效应。

数字平台网络暴力的演化机理包括：“线上+线下”双向互动下平台对特定议题的筛选与操控、“流量捕捉”主导下意见领袖的偏见制造与动员引导、“算法机制”运作下失真网暴信息的情境浸染与叙事转换，以及“第二自我”身份链条下的情绪激发与非理性表达。

在郑永康的案例中，群体极化表现得尤为明显。涉假赛禁赛的主播 CXY 的粉丝，在圈层内部形成了独立的叙事逻辑，通过炮制“偷走了 CXY 的人生”这样的阴谋论，将康康的冠军解释为“抢来的”，在幻想层面维护自己偶像的地位。当这种极端观点在圈内不断重复，就形成了“信息茧房”，让假赛选手粉丝围攻世界冠军的魔幻场景成为现实。

2.5 集体自恋：对群体形象的病态维护

集体自恋（Collective Narcissism）是指群体成员相信本群体具有卓越性，却未获得外界足够认可的心理状态。集体自恋的核心是怨恨——对内群体没有得到应有认可的怨恨。这种怨恨使得集体自恋者对外界的批评极度敏感，也促使他们对内群体中可能“损害”群体形象的

成员进行严厉清算。

集体自恋与本文提出的“内群体苛刻”高度相关：当内群体高位者出现失误，集体自恋者会感到群体的“卓越形象”受到威胁。这种威胁感引发两种反应：对外，敌视批评本群体的外人；对内，清算“损害”本群体形象的内己。

2.6 替罪羊理论：社会焦虑的转移机制

替罪羊理论（Scapegoat Theory）源自人类学的祭祀仪式，在社会心理学中指将挫折和不满转移给弱势个体或群体的心理机制。当社会存在普遍焦虑（如经济下行、阶层固化、未来不确定），公众需要宣泄口。而高曝光的本国公众人物，就成了最便捷的“替罪羊”——批评他们绝对安全，还能在道德上占据高点。

有学者分析吴京现象时指出：“与彼时国民情绪高涨对应的，是经济下行期大众情绪转变成了对抗生存的焦虑。从‘京学’被玩梗中就可以看出来：你在谈‘跳过楼’，我在专注‘拼多多提过现’的消费降级、‘改过需求’的职场牛马求生、‘凌晨三点背过书’的考公党为稳定工作能有多拼。”

这种“解构”看似是对吴京的嘲讽，实则是普通人通过消解宏大叙事来缓解自身焦虑。用“挤过早高峰”回击“跳过楼”，本质是在消解强势价值观带来的压迫感——把英雄拉回凡人身，能让普通人获得一种心理平衡。

3 | 案例分析：三位公众人物的舆论命运

3.1 刘翔：民族英雄的“失败”

刘翔的舆论命运，是“内群体苛刻”的经典案例。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后，刘翔被塑造成“黄种人的骄傲”“亚洲飞人”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退赛，舆论瞬间反转——他成了“刘跑跑”“骗子”“懦夫”。

刻板印象的束缚：刘翔现象主要是公众对体育和运动员的刻板印象造成的。在“东方人不能称霸短跑”的刻板印象被打破后，公众又建立了“民族英雄不能倒下”的新刻板印象。刘翔的伤病被刻意屏蔽，因为“英雄”不应该有病痛。

认知失调的代价：当刘翔退赛的现实与“英雄必胜”的期待冲突时，公众面临认知失调。解决失调的便捷方式是否定现实——认定刘翔是“假装受伤”“辜负国家”。正如评论所言：“刘翔，被十几亿人的欲望推到伦敦，他不是自己摔倒，而是被十几亿人的目光推倒。”

近因效应的放大：社会心理学家洛钦斯提出“近因效应”——最近或最后的印象对人的认知有强烈影响。一个总是守时的人，会因为最近的一次迟到导致印象改写。刘翔曾经的贡献，

被奥运会的两次失利覆盖。体育评论员杨华曾说：“对于跨栏运动来说，刘翔是百年不遇的天才，是史上对于突破黄种人极限贡献最大的运动员，刘翔之后再无刘翔。”但这份贡献，在舆论的“近因效应”中被抹去了。

商业价值的反噬：伦敦奥运会前，刘翔背负 17 个大品牌的合同，总价值近 10 亿元。商业利益与民族情绪的结合，将他推向神坛，也加重了他摔下神坛时的舆论反噬。当商业价值与运动成绩捆绑，任何失败都会被解读为“商业欺诈”。

3.2 吴京：“硬汉”标签的反噬

吴京的舆论变迁，体现了社会情绪变迁如何重塑公众人物的形象。2017 年《战狼 2》热映时，吴京是“硬汉精神”的代表；2025 年，他却成为全网玩梗解构的对象，催生了“京学”这一网络亚文化。

社会情绪的巨变：2017 年前后，经济向好，国民情绪高涨，民族自信心高涨。《战狼 2》将个人英雄主义和家国情怀结合，以“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”的口号引爆民族自豪感。吴京自此与爱国情怀多重绑定。

但到了当下，社会情绪发生了巨变。经济下行期，大众情绪转向对抗生存的焦虑。从“京学”被玩梗中可以看出：你在谈“跳过楼”，我在专注“拼多多提过现”的消费降级。大众对“吃苦主义”的买单热情也在降低——相比渲染吃苦的魅力，普通人更希望能平稳生活、避免吃苦。

“硬汉”符号的祛魅：吴京被吐槽的核心点在于，他明明没有参过军，却始终以“军人”自居，被网友调侃“唯一一个没有上过战场却有战后应激综合症的人”。他言谈中流露的“中国爷们论”和强说教意味，以及与妻子相处中的大男子主义，在当下审美多元、反感“爹味”的舆论环境中，精准踩雷。

采访语录的解构：吴京宣传《战狼 2》时的采访成为全网素材——“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”“我跳过楼，你跳过吗”等排比句，配上魔幻特效和音乐，成为鬼畜界的“新王”。网友不在意采访的完整语境，被放大的是表达中极易被提炼的句式和采访中标志性的晃头、抿嘴和微笑。吴京便由此在解构中成为其采访表现的附属品，从而失去了其现实层面的主体性地位。

3.3 郑永康：网络环境的推波助澜

郑永康（Zmjkkk）的案例，是互联网圈层时代“内群体苛刻”的新变种。2024 年，他率队夺得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冠军并加冕 FMVP，被公认为“CN 瓦第一人”。但夺冠后，他陷入了更为复杂的舆论漩涡。

圈层内群体的高度分化：郑永康时代的内群体，是高度细分的“CN 瓦粉丝”“EDG 粉丝”。这种圈层化的内群体，内聚力最强，对内群体成员的审视也最细致、最苛刻。一旦康康表现波动（如 2025 曼谷大师赛的失利），批评声便迅速反扑。

与主播 CXY 粉丝的冲突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。涉假赛禁赛的主播 CXY，其粉丝长期在康康直播间刷屏，甚至炮制出“康康偷走了 CXY 的人生”的论调，试图否定其冠军含金量。康康最终在直播中怒斥“老子是冠军，他是什么”，却反被部分网友指责“耍小孩子脾气”。

这种荒诞现象的背后，是圈层叙事逻辑的封闭性。在 CXY 粉丝的圈层里，存在一套独立的叙事逻辑——通过炮制“偷人生”这样的阴谋论，在幻想层面维护自己偶像的地位。当这种极端观点在圈内不断重复，就形成了“信息茧房”，从而进一步为对群体外部的攻击提供动力。

队内矛盾的公开化：夺冠后不久，EDG 内部发生 S1Mon 事件。康康作为核心，公开站队指责队友 S1Mon 在训练中的“幼稚做法”和不沟通等问题。尽管事出有因，但冠军队伍的内部矛盾公开化，也让康康被卷入“队内排挤（宫斗）”的舆论猜测。

3.4 案例比较：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

三位案例的比较，可以揭示“内群体苛刻”的共性机制与时代演变：

案例	成就领域	舆论巅峰	批评高峰	内群体类型	批评焦点	核心机制
刘翔	体育	2004 雅典 夺冠	2008 退 赛、2012 失利	民族国家	“欺骗”“懦夫”	刻板印象 + 近因效应
吴京	电影	2017 《战 狼 2》	2025“京 学”盛行	价值观认同 群体	“爹味”“入戏太深”	社会情绪变迁 + 解构
郑永康	电竞	2024 冠军 赛夺冠	2025 曼谷 大师赛后	圈层粉丝	“偷人生”“队内排 挤（宫斗）”	圈层极化 + 信息茧房

从刘翔到吴京到郑永康，内群体从宏大的“民族”逐渐演变为圈层化的“粉丝”，内聚力越来越强，对内审视也越来越细致。但不变的是“内群体苛刻”的核心逻辑——因为是我们的人，所以要求更高；因为代表我们，所以不容有失。。

4 | 成因机制：“内群体苛刻”何以发生？

4.1 心理机制：认同、投射与防御

社会认同的自我延伸：当个体将公众人物纳入“内群体”范畴，这些公众人物的成败就与个体的自尊产生关联。刘翔夺冠时，“我们赢了”；刘翔退赛时，“我们丢脸”。这种自我延伸使得内群体成员的失误，直接威胁到个体的自我价值感。

理想自我的投射：公众往往将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，投射给内群体中的高位者。刘翔承载着“黄种人也能称霸短跑”的梦想，吴京承载着“硬汉精神”的向往，康康承载着“CN 瓦崛起”的希望。当这些投射被现实击碎，公众感受到的不是对一个陌生人的失望，而是对“另一个自己”的愤怒。

防御机制的启动：为了维护受损的自我价值，公众启动防御机制——通过贬低当事人来挽回自尊。“不是我们不行，是他骗了我们”——这种归因既维护了群体的自尊，也避免了自我怀疑。

4.2 群体机制：内聚力的代价

“自己人”的高标准：内聚力越强的群体，对内群体成员的要求越高。因为群体成员的行为被视为“群体形象”的代表，任何瑕疵都会被放大为“给群体丢脸”。康康表现下滑时，最严厉的批评往往来自“CN 瓦粉丝”——因为他们在乎，所以不能容忍。

“家丑”敏感度：高内聚力群体对外界的评价极度敏感，这种敏感性转化为对内的高压监控。成员们担心“家丑外扬”，因此对内部问题采取“零容忍”态度。刘翔退赛时，“丢中国人脸”成为高频批评，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。

道德竞赛与表忠心理：互联网上存在一种现象：通过严苛批评内群体中的高位者，来向群体表忠心。骂刘翔“给中国人丢脸”，潜台词是“我才不像他那样，我比他更爱国”。这种“道德竞赛”是内聚力极高的群体中常见的内耗机制。

4.3 社会机制：转型期的焦虑转移

社会情绪的泄压阀：当社会存在普遍焦虑（经济下行、阶层固化、未来不确定），公众需要宣泄口。高曝光的本国公众人物成为最便捷的“泄压阀”——批评他们安全、合法，还能获得道德优越感。吴京被嘲讽的背后，是普通人对“吃苦主义”的厌倦，对“爹味说教”的反感，对自身生存焦虑的转移。

价值观冲突的投射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，存在着传统与现代、集体与个体、宏大与微观的价值观冲突。这些冲突往往投射到公众人物身上。吴京的“硬汉符号”被解构，本质上是年轻一代对传统男性气质的反思；刘翔的“民族英雄”被质疑，折射出公众对举国体制的复杂心态。

代际更替中的审美变迁：从刘翔到吴京到康康，舆论的变迁也反映了代际审美的更替。80后追捧的民族英雄，在90后眼中变成“符号化的负担”；90后推崇的硬汉形象，在00后看来成为“解构的素材”。每一代人都在通过重新评价前一代的英雄，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。

4.4 技术机制：互联网的放大效应

匿名性与责任消解：网络匿名性降低了行为人的心理约束，使其在发表攻击性言论时更

少顾忌法律后果。普通用户通过虚拟账号隐藏真实身份，事后难以追溯责任主体，这种“匿名即免责”的心态助长了网络暴力。

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：算法推荐机制使单一事件可在短时间内跨平台扩散，形成“群体极化”效应。郑永康事件中，CXY 粉丝的极端观点在圈层内部不断重复，形成信息茧房，让围攻冠军的魔幻场景成为可能。

流量经济与偏见制造：“流量捕捉”主导下，意见领袖为博取流量，通过“话题翻炒”“细节放大”等方式制造偏见，动员引导粉丝参与攻击。吴京的采访语录被翻出、被剪辑、被传播，背后是流量逻辑的驱动——争议=流量，流量=收益。

持续性攻击与精神高压：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11.08 亿，庞大的用户基数使得网络攻击可突破时空限制，形成 24 小时不间断的舆论施压。受害者长期处于精神高压状态，面临社会性死亡甚至生命威胁。

4.5 文化机制：传统与现代的张力

“严父情结”的文化基因：中国文化中存在着“严父慈母”的家庭角色分工。这种“严父”心态延伸到公共领域，表现为对“自己人”的苛刻要求——“因为是自己人，所以要求更严；因为是为你好，所以骂得更狠”。这种心态使对内群体的苛刻批评，获得了文化上的正当性。

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集体焦虑：传统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观念，在互联网时代演变为对外界评价的过度敏感。内群体成员担心“家丑”被外群体看到，因此对内部问题采取严厉的“内部清洗”。刘翔退赛引发的“丢人”论，正是这种焦虑的体现。

“成王败寇”的功利主义：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“成王败寇”的成功观——成功了就是英雄，失败了就是罪人。这种功利主义的成功观，使公众难以接受“英雄也会失败”的现实，也难以对失败的英雄保持尊重。

5 | 理论反思：“内群体苛刻”的社会心理学意涵

5.1 对内群体理论的拓展

本文提出的“内群体苛刻”概念，对社会心理学的内群体理论进行了有益拓展。传统的内群体理论主要关注“内外有别”——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贬低。但本文揭示的现象表明，内群体内部也存在差异化的对待模式：对内群体高位者的“苛刻”，与对内群体普通成员的“偏爱”并存。

这种差异化对待可以理解为“内群体偏好的二阶效应”——正是因为对内群体有强烈的偏爱，所以对内群体的“代表”有更高的期待；正是因为在意群体的形象，所以对可能损害群体

形象的高位者更加苛刻。正如有学者指出，内群体偏好与内群体贬低虽然方向相反，却是同一威胁管理机制对特定内外群体关系产生的不同反应。

5.2 对公众人物社会责任的再思考

“内群体苛刻”现象对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思考维度。公众人物需要认识到，当他们被纳入公众的“内群体”范畴，就意味着承担了符号化的使命——他们不再只是自己，更是群体理想的投射物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人物应该无条件迎合公众期待。刘翔的悲剧恰恰在于，他不得不在伤病缠身时站上赛场，因为“公众过于膨胀的价值期待，会刻意屏蔽一个运动常见的伤痛”。这种“不得不”，既伤害了运动员本人，也伤害了体育精神本身。

因此，公众人物需要在“回应公众期待”与“保持真实自我”之间寻找平衡。同时，公众也需要反思：我们对“自己人”的苛刻，是否反而伤害了我们真正珍视的东西？

5.3 对网民媒介素养的呼唤

“内群体苛刻”现象的消解，最终有赖于网民媒介素养的提升。具体而言，需要培养以下几种意识：

“同时代人”的鉴赏力：有评论指出，人们“很难看见同时代人的好，很难领会同时代人的贡献，我们的神话往往都投向从前的人和事”。这种“当下盲视”使我们难以公正评价同时代的精英。我们需要培养“站在未来看现在”的眼光，学会欣赏那些尚在进程中的人和事。

祛魅时代的理性态度：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祛魅的时代，一切神圣形象都可以被解构、被娱乐。但祛魅不等于亵渎，解构不等于否定。在玩梗之余，也需要保持一份理性——吴京“作为电影人，为国产商业电影所做的拓荒与努力”，刘翔“对于突破黄种人极限贡献最大的运动员”的历史地位，这些事实不应被淹没在解构的喧嚣中。

共情能力的培养：网络匿名的环境中，人们容易忘记屏幕对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培养共情能力，意味着在发表攻击性言论前，想一想如果自己是当事人，会作何感受。

5.4 对网络舆论生态建设的启示

“内群体苛刻”现象的治理，需要多方协同努力。从法律规制层面，需要完善网络暴力的法律定义、构成要件及责任形式；从平台治理层面，需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，建立“事前过滤—事中监测—事后处置”的全流程防控机制；从社会协同层面，需要加强行业自律，开展媒介素养教育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需要构建一种健康的群体认同观——既能保持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，又能容忍群体成员的缺陷和失误；既能为群体的成就而骄傲，也能在群体遭遇挫折时保持理性。健康的群体认同，是“内群体苛刻”最好的解药。

6 | 结论

本文以刘翔、吴京、郑永康三位公众人物为案例，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了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中独特的“内群体苛刻”现象。研究发现：

第一，“内群体苛刻”的核心机制是：高内聚力的内群体对内群体高位者施加严苛审视，其严苛程度远超对外群体的审视。这种看似“内外有别”的对待方式，实则是内群体偏好的二阶效应——因为在意，所以苛刻；因为期待，所以不容失误。

第二，“内群体苛刻”的形成是多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：心理机制上，涉及社会认同的自我延伸、理想自我的投射与防御机制的启动；群体机制上，涉及“自己人”的高标准、“家丑”敏感度与道德竞赛；社会机制上，涉及转型期的焦虑转移与价值观冲突；技术机制上，涉及互联网的匿名性、算法推荐与流量经济；文化机制上，涉及“严父情结”“家丑不可外扬”与“成王败寇”的传统心态。

第三，“内群体苛刻”本质上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心理的投射。从刘翔到吴京到康康，舆论的变迁折射了社会情绪、代际审美、群体形态的演变——内群体从宏大的“民族”演变为圈层化的“粉丝”，焦虑从“民族复兴”转为“个体生存”，批评从“道德审判”转为“解构狂欢”。

第四，“内群体苛刻”的消解需要多方努力：公众需要提升媒介素养，学会“站在未来看现在”；平台需要履行治理责任，遏制网络暴力的蔓延；社会需要构建健康的群体认同观，在归属与批判、自豪与反思之间找到平衡。

正如有学者所言：“评价一个公众人物，怎样才比较公正？也许，较为公正的方式，是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去看、去评价。”对待刘翔、吴京、郑永康，对待所有为我们这个时代贡献过卓越成就的中国人，或许都该如此——站在未来，我们才能“见好”，才能看到他们在整个时代中的位置，才能明白他们对我们精神生活的贡献。尽管这很难，但值得努力。

参考文献

Golec de Zavala, A., Dyduch-Hazar, K., & Lantos, D. (2019). Collective narcissism: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investing self-worth in the ingroup's image. *Political Psychology*.

被骂的吴京，没有后视镜. (2025, September 14). *百度百科TA说*。

从“中国战狼”到“京学被嘲”，互联网解构文学终于轮到吴京了？ (2025, September 10). *创业邦*。

韩松落. (2015, April 19). 站在未来看刘翔. *现代快报*, D6。

刘翔现象引起的社会心理学思考. (2014). *科技信息*, (7)。

伟博研究 | 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困境与解决路径探析. (2025, July 17). 伟博律师事务所。

燕赵晚报. (2012, August 8). 推倒刘翔的，究竟是谁？ 央视网转载。

翟岩, & 李小波. (2025). 数字平台网络暴力：内涵证立、生成机制与治理路径. *科技与法律*, (3), 93–104。

张循铖. (2020). 他人即地狱？ 山东大学心理健康教育。

周晴, & 吴奇. (2019). 群际偏差的进化：人类对暴力与疾病威胁的适应. *心理科学进展*, 27(12), 2084–2096。